

中国居民在环境意识与 环保态度方面的城乡差异^①

马戎 郭建如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22.0%，但中国的淡水和可耕地资源只占到世界总量的 7.0%，森林和石油资源分别只占到世界总量的 3.0% 和 2.0%（马戎：1997：287）。仅在 1990 到 1994 年这短短的 4 年期间，中国的可耕地就从 9 080 万公顷减少到 8 740 万公顷。在 1993 年，中国进口了 31.4 亿美元的谷物（2 200 万吨），由于国际市场的谷物价格受到中国大量进口的强烈影响，“谁将养活中国”成为西方杂志和报纸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不得不为自己、也为世界找到一条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由于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缘故，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曾经长期滞后于西方国家，而这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受苦难的原因。帝国主义的人侵和国内战争一度摧毁了中国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经济基础。这也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国家领导人在为中国现代化设计发展战略时总是格外谨慎。为了中国人的子孙万代仍然有一个良好的生存条件，为了中国的经济能够保持持续性地发展，合理地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与保护生态环境，便成为中国政府的两项基本国策。

在 90 年代，有关环境与生态保护的知识也开始被系统地介绍进中国的大学。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

学研究所组织人员将美国社会学者 Charles Harper 撰写的《环境与社会》（Environment and Society, 1996）一书译为中文，并计划在 1999 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生课程。对中国说，环境保护在 21 世纪将是非常重要和艰巨的任务，我们期望环境科学通过科学研究和学校教育的结合而在中国逐步地发展起来。

本文的作者曾出席了 1995 年 12 月在巴西 Belo Horizonte 市召开的“全球环境调查项目”（GOES,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Survey）的一次会议。在这次次会议期间，与会者们探讨了使用统一问卷同时在几个国家开展对于公众环境意识和对于环境保护态度进行调查的计划。在随后的一年中，课题组成员们分别在几个国家（巴西、中国、德国、荷兰、日本、美国等）进行了这个项目的试调查。中国的“全球环境调查项目”试调查工作是 1996 年夏天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组织完成的。在这次试调查中，调查小组总共访问了 155 户，选择的被访者代表了三类社区（城市、镇和农村）的居民（大约每类为 50 户）。由于这次调查的抽样规模很小，许多复杂的定量分析无法进行。因此，在 1997 年夏天我们组织了第二次规模较大的调查。本文就是在 1997 年调查

^① 本文原文为英文研究报告，由马戎进行数据分析并执笔完成。郭建如参加了课题的户访和数据整理工作，并把这篇报告译成中文。

所得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完成的。

关于应当优先考虑的全国性问题

1. 最应优先考虑的全国性问题是什么

所谓“优先考虑的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民众对于政府的期望。从整体被访样本来看，共有19.2%的被访者认为环境污染是最严重的问题，居于优先考虑的首位(见表1)。1990年美国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虽然只有少数人认为环境问题是美国面临的头号问题，但有63%的人认为环境问题可以列入美国面临的三、四个主要问题之一(戴星翼，1995:93)。可见1997年中国民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甚至超过了1990年的美国公众。

从被访者总体关注问题的优先排序来看，“官员腐败”位居第二位(16.0%)，“经济发展”排在第三位(10.2%)。但是仔细地把城乡居民加以分别考察之后，我们发现更大比例的城市居民认为污染最为严重(29.3%)，而较大比例的小城镇居民和农民则认为腐败是最严重的问题(分别为26.7%和17.4%)。对小城镇和农村的被访者来说，环境成为居于第二位的严重问题(分别为14.9%和12.6%)，这一点表明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环境知识有明显提高，这是令人欣慰的。另一方面，令人奇怪的是在大城市被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认为腐败是第一位的严重问题(仅占3.8%)。这一对比有可能是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比较明显所致。

表1 当前全国最重要的问题

重要问题	城市		城镇		农村		合计	
	个案	%	个案	%	个案	%	个案	%
环境污染	84	29.3	44	14.9	31	12.6	159	19.2
官员腐败	11	3.8	79	26.7	43	17.4	133	16.0
失业	19	6.6	18	6.1	1	0.4	38	4.6
人口过多	32	11.1	27	9.1	17	6.9	76	9.2
教育	13	4.5	14	4.7	12	4.9	39	4.7
犯罪控制	20	7.0	33	11.1	13	5.3	66	8.0
经济发展	38	13.2	24	8.1	23	9.3	85	10.2
收入	6	2.1	4	1.4	13	5.3	23	2.8
通货膨胀	8	2.8	6	2.0	7	2.8	21	2.5
水资源	1	0.3	0	0.0	0	0.0	1	0.1
台湾统一	2	0.7	0	0.0	1	0.0	3	0.4
道德教育	9	3.1	4	1.4	0	0.0	13	1.6
农民收入等	2	0.7	0	0.0	6	2.4	8	1.0
不知道	42	14.6	43	14.5	80	32.4	165	19.9
总计(纵向)	287	100.0	296	100.0	247	100.0	830	100.0
总计(横向)		34.6		35.7		29.8		100.0

如前面对职业结构的讨论一样，与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相比(6.1%和0.4%)，“失业”更为城市居民

所严重关注(占6.6%),“人口过多”在城市里(11.1%)也比小城镇(9.1%)和农村(5.3%)引起更多的关注。应该注意到,有11.1%的小城镇被访者特别强调“控制犯罪”,由于小城镇处于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结合部,有大量的临时性居民和途经过此的路人,所以人口密集地区小城镇的治安情况不好,控制小城镇里的犯罪也比较十分困难。

在问卷的另一部分中,我们请被访者从4个选项中选出“最重要的”和“第二重要的”,这4个选项分别是:(1)保持社会稳定(维持国家秩序);(2)人们参与政府决策(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上人们有更多的说话权利);(3)控制通货膨胀(抑制上涨的物价)和

(4)保护言论自由。从表2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所有被访者中有74.0%的人选择(1)“保持社会稳定”作为最重要的问题,相比而言,城市居民(74.8%)比农村居民(64.8%)更为严肃地看待此问题。与此同时,因为农村居民挣的钱比城市居民少,他们中有20.6%的人选择(3)“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优先考虑的事。控制通货膨胀对于城市、小城镇和农村来讲,都是第二个重要选择中的首位(分别为41.5%、57.4%和42.1%)。如果我们将认为“控制通货膨胀”是“最重要”和“第二重要”的农村被访者的百分比合并起来,选择这个问题的总百分比将达到62.7%,可见物价问题是农村居民普遍关注的。

表2 有关政府政策优先性选择的观点

		城市		城镇		农村		合计	
		个案	%	个案	%	个案	%	个案	%
最重要	保持社会稳定	229	79.8	227	76.7	158	64.0	614	74.0
	人民参与政府决策	15	5.2	20	6.8	13	5.3	48	5.8
	控制通货膨胀	31	10.8	36	12.2	51	20.6	118	14.2
	保护言论自由	4	1.4	4	1.4	5	2.0	13	1.6
	不知道	8	2.8	9	3.0	20	8.1	37	4.5
	总计(纵向)	287	100.0	296	100.0	247	100.0	830	100.0
	总计(横向)		34.6		35.7		29.8		100.0
第二重要	保持社会稳定	36	12.5	39	13.2	51	20.6	126	15.2
	人民参与政府决策	76	26.5	40	13.5	42	17.0	158	19.0
	控制通货膨胀	119	41.5	170	57.4	104	42.1	393	47.3
	保护言论自由	28	9.8	29	9.8	21	8.5	78	9.4
	不知道	28	9.8	18	6.1	29	11.7	75	9.0
	总计(纵向)	287	100.0	296	100.0	247	100.0	830	100.0
	总计(横向)		34.6		35.7		29.8		100.0

从户访结果来看,“保护言论自由”在现时并不为人们所特别强调。只有1.4—2%的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的被访者选择这个问题作为“最重要的问题”,他们中另有的8.5—9.8%的人将它作为“第二重要的”。有26.5%的城市被访者和13.5%的小城

镇被访者将“人民参与政府政策决策”列为“第二重要”,排在其后的是“控制通货膨胀”。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中国,人们是通过其他的渠道而不是通过“言论自由”来参与公众事务和政府决策的。中国的民主参与机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2. 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选择

被访者被要求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这两个选项间给出哪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普遍的看法是：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人们更侧重于保护环境，而在发展中国家里人们会比较注重发展经济，因

为经济发展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水平、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更好的教育设施等等。类似的看法也认为大城市居民会更愿选择环境保护，而农村居民更愿选择经济发展。

表3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重要性的比较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哪个更重要？	城市		城镇		农村		合计	
	个案	%	个案	%	个案	%	个案	%
1. 环境保护	160	57.1	168	57.3	107	46.9	435	54.3
2. 经济发展	115	41.1	113	38.6	110	48.2	338	42.2
3. 两者都重要	5	1.8	12	4.1	11	4.8	28	3.5
总计(纵向)	280	100.0	293	100.0	228	100.0	801	100.0
总计(横向)		35.0		36.6		28.5		100.0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中，表3并没有提供一个鲜明的城乡差别。认为经济发展更重要的农村被访者(48.2%)比选择环境保护的百分比(46.9%)仅略高一点。应当说，在政府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宣传运动开展了几年之后，环境污染及其危害性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已经广为人知。

中国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

在我们的问卷中，我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与生态保护这些议题提出问题，并从中了解我国城乡居民的观点与态度。

1. 什么是中国当前最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问卷中列出了15项供被访者来选择。其中，“空气污染”、“人口过多”和“水污染”是人们最关心

的3项问题(见表4)。进一步的分析说明城市被访者和农村的被访者最关心的都是“空气污染”，城市居民对“水污染”的关注低于农村居民的关注程度。工业废物接着上面三个(在总体中9.5%)。在这个调查中农村被访者甚至比城市人更关心工业废物。这是因为本次调查中选择的若干农村社区位于在一些产生空气污染和固体废物的工厂附近。

中国人民大学1993年对516人进行的问卷调查也涉及到了人们最关注的环境问题。回答中对于“中国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的选择依次为：水污染(58.5%)，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58.5%)，大气污染(46.8%)，垃圾及废弃物(45.6%)，土壤沙漠化和耕地减少(41.5%)(刘大椿等，1995:89)。虽然提供给被访者的选择项目不完全相同，但是大致来说，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的结果与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十分相近的。

表4 中国最严重的环境问题

存在的最严重问题*	城市		城镇		农村		合计	
	个案	%	个案	%	个案	%	个案	%
人口过多	83	28.9	69	23.3	43	17.4	195	23.5

空气污染	88	30.7	68	23.0	59	23.9	215	25.9
水污染	38	13.2	54	18.2	52	21.1	144	17.3
土壤侵蚀	3	1.0	4	1.4	3	1.2	10	1.2
废物利用	7	2.4	7	2.4	8	3.2	22	2.7
生物多样性	0	0.0	1	0.3	0	0.0	1	0.1
全球变暖	5	1.7	6	2.0	2	0.8	13	1.6
臭氧层破坏	3	1.0	2	0.7	1	0.4	6	0.7
森林破坏	8	2.8	9	3.0	1	0.4	18	2.2
沙漠化	5	1.7	4	1.4	3	1.2	12	1.4
土壤污染	3	1.0	1	0.3	1	0.4	5	0.6
工业废物	26	9.1	24	8.1	29	11.7	79	9.5
卫生设施	3	1.0	7	2.4	2	0.8	12	1.4
其他	11	3.8	15	5.1	11	4.5	37	4.5
不知道	4	1.4	25	8.4	32	13.0	61	7.3
总计(纵向)	287	100.0	296	100.0	247	100.0	830	100.0
总计(横向)		34.6		35.7		29.8		100.0

* 在访问中,没有人回答“酸雨”和“核能/有毒废物”,因此标准问卷中的这两项被排除。

总的来说,农村和城市的人们似乎都不太熟悉象“生物多样性”(0.1%)、“土壤污染”(0.6%)和“臭氧层破坏”(0.7%)这些关于生态变迁的项目。很明显,城市居民对于这些问题具有稍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可能是通过他们更多地读报或看电视所得到的。

2. 居住地区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

在问卷中我们向被访者提出了9个主要的问题,并请他们列出这些问题在他们所生活地区的严重程度。

(1)“人口过多”:78.7%的城市被访者将这个问题列为“非常严重”和“严重”,而同时53.7%的小城镇被访者和63.6%的农村被访者认为“不严重”或“没问题”。城市里的人口密度很高,使得人们的居住和活动空间受到限制,所以人口密度引起了城市居民更多的关注。

(2)“空气污染”:大多数的城市被访者(83.6%)将它列为“非常严重”或“严重”。72.9%和66.0%的

小城镇与农村被访者给出了同样的等级。另一方面,也有36.2%的小城镇被访者和31.2%的农村被访者将之列为“不严重”或“没有问题”。这表明空气污染在一些调查地点比较严重但在其他地点状况很好。在调查结果中可以反映出来地区之间污染的不平衡性。

(3)“水污染”:城市通常装备很好的供水系统,因此只有17.8%的城市被访者认为水污染“很严重”。在中国许多村庄仍然依赖河和井来供水,这些水源很容易受到附近工厂排出废水的污染。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有38.1%的农村被访者将水污染列为“非常严重”。

(4)“土壤侵蚀”:分别只有21.3%、7.1%和11.0%的城市、小城镇和农村被访者认为“土壤侵蚀”很严重或非常严重。土壤侵蚀并不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一些城市居民通过媒介宣传知道有关情况,而其他的小城镇或农村居民真的不了解其内容和危害。这种情况可能会解释为什么68.0%的农村

被访者认为“没有问题”。

(5)“工业废物”:50.1%的城市被访者认为它“严重”或“非常严重”。农村被访者的回答显示了较大的差异:28.3%的人认为它“非常严重”而另外24.7%的人认为它“没有问题”。这也反映出在工业废物排放方面所存在的较大的地区差异性。

(6)“生物多样性”:对这个问题回答“不知道”的被访者的百分比,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分别为36.6%、38.2%和30.8%。我们的访谈员努力向被访者解释了这个项目的内容与意义,但是很难说他们究竟对此理解了多少。

(7)“全球变暖”:农村和城市被访者有同样高百分比的人“不知道”这个话题。14.6%的城市被访者认为它“很重要”,主要原因是他们感受到了1997年夏天中国北方的高温。

(8)“森林破坏和沙漠化”:城市、城镇和农村的被访者分别有27.9%、2.4%和1.2%的人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或“严重”。城市的居民由于生活环境中人口密度高,十分热爱树木和绿地。农民们则很少注意这一点,而且他们有些生产活动(如开荒、建房等)破坏了周围现存的森林。

(9)“卫生设施”:许多被访者显示了他们对此问题的关心。总的来说,在所有被访者中有49.8%的人认为“卫生设施”“非常重要”或者“重要”。这反映出来,在中国城市与农村,在公众卫生设施这个方面还有许多改进工作应该做。

3. 谁最应该对环境保护负责?

所有的被访者被分为三个年龄组以调查不同年龄的人们中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年老的被访者(50岁以上)认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最应负责”,年轻的年龄群体(30岁以下)认为“每个人”“最应负责”(城市、城镇和农村分别为37.4%、55.6%和60%)。大城市的中年群体认为个人(40.4%)比地方政府(36.2%)更“应负责任”,而同样的年龄群在小城镇和农村则转向认为地方政府“最应负责”(分别为46.3%和55.2%)。由于老年人群体过去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和组织性强的活动中,他们传统上认为政府应该担负起责任。年轻的一代接受了来自西方国家的更多的文化影响,他们并不期望政府在许多活动组织中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因此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个人是重要的并应对他们的环境负责。

4. 人们对政府应投资领域的观点

问卷要求被访者从一系列可能性中依次选择3个他们认为政府应优先投资的领域。大多数的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的被访者对于“最优先的投资领域”有着一个共同选择:“发展教育”,百分比分别为52.0%、43.6%和45.8%。从被访者总体来看,在第二个需要政府投资的领域里,被访者在8种选择中倾向于“犯罪控制”(21.6%),第三个重要投资领域多数人选择的是“环境保护”(22.8%)。农村被访者中有更多的人对于第二个优先投资领域倾向于“发展教育”(27.9%),第三个优先领域倾向于“计划生育”(20.4%)。在农村地区,人们并不认为“人口过多”是很严重的,同时他们希望政府继续投资于“计划生育项目”。这个项目给人们带来许多好处:向妇女们提供免费的保健和孕前检查,免费的避孕药物等。应当说,计划生育已经在中国成为公众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对有关环境保护的一些提法的观点

在“全球环境调查项目”(GOES)的标准问卷中,列举了8种提法,要求被访者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可以从5种态度当中选择其中一个:“很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不知道”。

(1)“政府应投资于劝说人们节约能源的运动”。在所有被访者中大约有57.5%的人“同意”这个说法(城市、城镇和农村分别为52.3%、59.5%和61.1%)。另有23.6%的人“很同意”。两类选择加在一起达81.1%,人们大多认识到能源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讲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2)“政府应提高汽油税和其他燃料税以减少能源消耗”。解放以后,个人所得税引入中国是在80年代后期,在中国人们尚不习惯纳税,也不希望个人支付更多的税。所以,这个提法只有37.3%的人表示“同意”并有34.3%表示“不同意”是不奇怪的。

(3)“政府应限制或对每家可使用的能源数量做出限额”。“不同意”的人(41.7%)比“同意”的人(34.1%)多。城市和农村的被访者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4)“政府应投资于劝说人们减少生活垃圾的活动”。大约58.3%的被访者“同意”,14.9%的人“很不同意”,15.3%的人“不同意”。民众基本的态度是支持这个主张,但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对这个提法的

态度有所不同。

(5)“政府应让每个家庭为其垃圾付费”。支持与反对的两方大致平衡:37.3%的人“同意”,38.1%的人“不同意”,“很同意”的人为6.0%，“很不同意”的为8.9%。人们较少关注政府投资方向,而更关心将从他们自己口袋中拿出多少税款或费用。

(6)“政府应控制商品包装的数量和类型,即便这将会导致商品涨价”。答案是47.0%的人“同意”,23.0%的人“不同意”,17.7%的人说他们“不知道”。

(7)“政府可以增加税收,如果增收的钱是用于保护环境”。45.1%的人“同意”,26.7%的人“不同意”这个主张,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没有明显的城乡差别。

(8)“如果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话,我愿意多付出购物价格的20.0%”。总共有48.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而36.2%的人表示他们无法选择。这是典型西方式的问题,很明显,在中国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很困难的。

人们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的参与

1. 人们是否经常关心环境生态?

因为政府关于保护环境的宣传运动已经持续了多年,当被访者被问及本地环境状况,并问他是否关心环境问题时,他们中80.0%的人(无论是城市、小城镇或农村)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并不奇怪。当问到他们是否关心“全国”或“全球”的环境状况时,回答“是”的百分比下降到50—70.0%。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对这些普通居民或农民来说,更多地关心他们周围而不是“全球”或“全国”的环境是很自然的。

有80.0%以上的农村和城市的被访者说,他们相信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环境生态有影响。这是他们在未来可能会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一个重要信号。另一方面,50.0%以上的被访者说只有在他们感到受污染之害时,他们才会关心环境。媒体的影响是引导人们关心环境的第二个因素,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的被访者分别有17.9%、19.6%和15.8%的人选择此项。随着电视的普及以及电视节目和报纸涵盖范围的不断扩大,新闻媒体目前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正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2. 当人们面临环境污染问题时他们会求助于谁?

政府的管理和调控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在城市地区要比农村地区大。因此,城市被访者中有很大比例(37.3%)的人报告说在面临环境污染问题时,首先求助于政府。相比之下,在农村的百分比是20.6%。小城镇和农村的居民倾向于首先找环保部门求助(分别为47.3%和32.8%)。城市被访者中有很大比例(38.0%)的人提到他们的第二个选择是找环保部门,而35.8%的小城镇被访者和31.6%的农村被访者第二个选择是去找地方政府。而倾向于找法院解决的只有2.0%。

在中国,人们对法院和司法系统期望不高可能是有些原因的,至少在与环境污染相关的情况中是很明显的。这可能会解释为什么被访者中有那么高比例的人将“法院”作为他们最不愿意解决问题的地方。城市、城镇和农村的百分比分别是36.6%、61.8%和53.8%。因此,政府和它的集体管理部门(环保机构)就成为人们面临环境损害时寻求解决希望所在。

3. 人们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环境问题的解决?

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人们在他们面临某些环境污染损害时,可能首先会向环保部门抱怨,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时,城市和农村的人们还是会去找政府。48.4%的城市被访者、60.8%的城镇被访者和59.5%的农村被访者回答他们将向拥有权威的政府诉说。

值得注意的是,28.9%的城市被访者承认他们将会通过媒体寻求解决。这项选择在小城镇(12.2%)和农村(8.5%)的百分比是相对比较低的。报纸和电视节目更多地与城市居民相联系,在城市生活中也更活跃。

当人们面临污染或其他环境损害时,他们如何发现他们能够据以抗争或争取的法定权利呢?在城市里,最多的人(33.4%)说他们将查阅法律和政府法规,24.0%的人将询问有这方面专长的人,26.1%的人说他们不知道也不打听。如果我们忽略掉“无回答”的群体,我们就会看到城市、小城镇或农村被访者中最少数的群体是去“询问政府官员”。既然政府在一些场合并不处于中立位置(许多制造污染的企业是由地方政府主办的),但是却有在地方上处理问题的权力与责任,人们会怀疑这些官员是否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4. 人们对于环境运动的观点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后,中国政府发起了长期运动来介绍全球环境变化和对未来危害的知识。出版了许多有关介绍环境变化和环境保护的杂志和书籍。在问卷中,我们询问被访者关于他们对这些运动和相关宣传效果的判断。

大约70.0%的被访者提到他们认为在这些宣传中有关环境的知识提供得太少,只有4.1%的人认为较多。大约有70.0%的人说,这些宣传对于他们受到环境损害时应当具有相关权利介绍得较少,另有2.4%的人认为较多。64.0%以上的被访者和9.8%的被访者认为宣传中关于环境保护状况严重性的信息较少或没有。总的来说,似乎人们想知道更多的有关环境变迁的情况。

5. 环境立法和相关法律的实施

总的来说,59.3%的被访者知道政府在为环保立法,53.5%的人知道1979年由中央政府颁布的“环境保护法”。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后,1993年我国出版了《中国21世纪议程》,政府在电视和报纸上向普通公民介绍这些法律和文件。另一方面,只有很小的群体(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分别为20.2%、26%和24.3%)相信这些法律和法规将会被严格地执行。有26.3%的被访者明确表明他们不这样认为,44.1%的人认为“很难讲”。颁布法律是一回事,真正实施它又是一回事。有关环境的法律的实施似乎比通过这些法律更加重要。

6. 对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各项活动的参与态度

(1) 义务劳动: 大约83.0%的城市被访者、77.4%的小城镇被访者和66.0%的农村被访者说他们曾经参加过与环保有关的义务劳动。在中国每年三月中旬有个“植树节”,各个机构普遍组织职工参加“植树节”的造林活动。但是,也有21.5%的农村被访者表示他们在将来不会参加义务劳动,相比较之下,持这种消极态度的人在城市里仅为2.4%。城乡差别在这方面也体现出来。

(2) 向环保团体捐钱: 在向为环保工作的团体捐钱方面,城乡差别就更加明显。大约20.0%的城市被访者捐过钱,48.4%的人说他们在将来会捐钱。这个百分比在农村的被访者中下降到7.7%和32.8%。55.9%的人清楚地说他们在将来不会捐钱。

(3) 参加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会议: 总的来说,4.7%的被访者参加过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会议,

22.2%的人说他们将会参加,57.1%的人说他们不会参加。在中国各个机构中,会议通常是由政府组织来学习文件和政策的,人们对参加会议一般并不积极。

(4) 为环境保护与政府官员联络: 4.3%的被访者提到他们曾做过,16.3%的人说他们会,而62.2%的人说他们不会。

(5) 在有关环境保护的请愿书上签字: 3.2%的人说他们曾做过,52.5%的人说在未来也不会这样做。⁵后一群体的比例在城市里较低(30.7%),在农村里较高(65.2%)。在中国,递交请愿书对于人们来讲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6) 参与与环保有关的抵制活动: 1.8%的人说他们曾做过,而59.2%的人说他们将不会参加。情况同请愿是一样的。

(7) 参加游行: 3.0%的人说他们在过去曾参加过,61.2%的人说他们在将来不会参加。后者的百分比在城市里也较低,而在农村里较高。上街游行在中国是受到政府法规限制的,在大多数情况中它无助于解决问题。

工业污染的问题

许多污染是直接由工业生产引起的,如空气、水、噪音、固体废物等。普通人可能面临的环境问题,大多可归于工业污染。所以,调查人们如何考虑与工业污染有关的关键问题可能会提供一些更好地理解他们对待环境变化的态度和看法。

1. 影响工业污染的关键因素

在问卷中,被访者被询问他们关于造成工业污染的若干影响因素的观点。

(1) “企业管理人员不关心环境,他们优先考虑的是挣钱”。77.8%的被访者认为这是导致工业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没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只有7.8%的人认为它并不重要。

(2) “没有限制污染的足够的法律,所以工厂可以逃避惩罚”。55.3%的人认为这个因素很重要,另有10.2%的被访者认为不重要。

(3) “环保部门力量太弱”。总的来说,50.6%的人认为这个因素很重要,另有13.1%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其中,60.3%的城市被访者认为这个因素重要,6.1%的人不这样认为。相比较,45.1%的农村被访者认为它重要,21.4%的人不这样认为。从这

个比较当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环保部门在城市扮演着比在农村地区更为软弱的角色。

(4)“普通人对污染无法控制或无法施加影响”。47.0%的被访者认为这个因素很重要,而22.8%的人认为不重要。城市被访者想在污染控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们抱怨他们的影响太弱,所以54.7%的城市被访者认为这个因素重要,12.1%的人认为不重要。相比较,很少有农村被访者抱怨这个因素。

(5)“环境执法阻力太大”。57.8%的城市被访者认为这个因素很重要,而只有37.8%的农村被访者认为它重要。城市是比农村更复杂的社区,法律的执行也可能会遇到更多更复杂的干扰。

2.哪一个更重要:工厂的经济效益或周围环境的保护?

城乡差异在这个问题上很明显。对于被访者来讲,有两个供选择的回答。28.1%的城市被访者同意第一个主张:“优先维持工厂,污染应该在工厂有能力时进行治理”。农村被访者有45.5%的人同意。除了他们雇佣的员工之外,工厂一般不与城市居民发生直接关系。建在农村的工厂为村民提供工作,通过这类联系,企业与农村居民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对于第二个回答城市和农村的被访者有着类似的选择。70.0%以上的被访者同意“如果工厂危害重大的话,就应该关闭”。这是政府的政策,许多人从媒体或文件中知道这一点。以官方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

3.在工业污染案件中政府与法院的态度

当地方社区和民众指责某个工厂制造污染并将这个争论提交到地方政府甚至法院时,政府官员和法院法官的态度会是什么样呢?

在问卷中,很有意思的是在农村和城市地区人们似乎都落入了两个极端:在城市被访者中,34.5%的人相信政府和法官会保持中立的态度并依据法律判决,而33.8%的人相信他们会偏向给他们更大压力的更强大的一方(或是企业,或是地方社区和民众)。在农村被访者中,这个百分比分别是27.1%和29.6%。

在城市,18.1%的被访者相信政府和法院会保护人民的利益,7.7%的人相信他们会偏袒工厂。在农村,9.7%的人相信人民的利益会为政府和法院所关注,而22.7%的人认为他们会偏向工厂。与城市

居民相比,农村居民似乎更不相信政府和法院。

对未来环境变化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看法

在问卷的最后部分,要求被访者谈论他们对未来环境变化的看法。在这个题目下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环境问题在未来的5—10年里是否会成为您所在地区最严重的问题”?有56.1%的被访者回答“是”,38.6%的人回答“否”。

第二个问题是“您对今后环境问题的解决持何看法?”只有28.4%的人(城市20.2%,农村34.8%)说他们是乐观的,60.0%的人说他们不太乐观,甚至有10.2%的人明确地说他们是悲观的。

除了城乡差异,我们也试图引入其他变量来解释被访者对未来看法的不同。人们的教育背景是决定他们态度和观点的重要个人特征。我们对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关于斯皮尔曼相关系数(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的计算结果表明了在环境问题的所有方面,上学历数与未来看法之间均呈负相关关系,这即是说,受到的学校教育越多,对环境污染就越担心,对污染治理和未来变化越悲观。

由于收入变量与教育变量相关,所以收入较高的家庭对环境更加关注,因而对环境的未来发展容易持有比较悲观的看法。回顾美国的环境运动发展史,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收入条件很好的那部分人(即中产阶级)在推动环境保护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戴星翼,1995:94)。

家庭年均收入可能是解释人们对环境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变量。较高的收入与城市特征(相关系数为 -0.6050^{**})相关,也和教育水平(0.4529^{**})相关。教育、年龄和城市特征与环境问题解决的乐观看法相联系。有较高收入的被访者更担心空气污染(-0.1194^{**})、臭氧层破坏(-0.2640^{**})和全球变暖(-0.2614^{**})等生态环境的破坏。

讨论

基于以上对于1997年调查数据的各种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城乡居民对环境变化的意识和态度的一个总的图景。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在环境意识和环保态度方面的差异是很明显的,这与我们1996年进行的“全球环境调查项目”试调查的结果相一致(马戎,李建新:1997)。由于有了一个相对较大

的样本规模(830户),与1996年调查相比,我们在分析1997年调查资料时可以使用更多的统计分析方法,也可以分析得更细致、更具体。

环境保护在中国是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只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才逐步在中国变得广为人知。考虑到这些关于全球环境变化和危害的新知识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间还很短,这次调查表明有许多城市甚至是农村居民对于诸如“污染”、“再生循环利用”、“生物多样性”等专业术语也有了一些了解,这的确很令人鼓舞。

通过对被访者的调查,我们注意到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受教育很少,收入也很低,但是他们大多愿意做些义务劳动以保护环境,将环境保护视为优先考虑的事,初步具备了有关环境立法和法律的知识,也严肃地考虑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些都是不容易实现的。

很显然,在向普通公民介绍环境知识和鼓励人们关注环境变化方面,政府组织的环境保护运动以及由政府所支持和鼓励的其他媒体的宣传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我国政府组织了许多大型工程来保护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其中一个例子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带”。在1978—1995年期间,605万公顷人工种植的树林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来,受保护的农田和草场达到1000万公顷(曲格平 李金昌,1992:77)。淮河流域的水污染控制直接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进行,对于制造污染的小造纸厂采取了强行停产拆除的措施。在环境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媒体对于这些工程和治理活动通常进行大量的报道,以争取地方政府和民众对这些项目的支持。

当然中国今天仍然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中国保持继续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方向,我们可以期待这个国家在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当人们受到很好的教育,政府有强大的财政时,环境保护将会更加有效地进行。我们应该认识到环

境保护的严重性,但是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又深深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社会体制、政府政策法规等等的影响(马戎,1998),只有系统和客观地了解广大民众在环境问题上的观念和态度,政府和其它社会组织才能对症下药地制定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推动环保的方式,所以对于公众环境意识和环保态度的调查,应当定期进行,不断深化修正我们的认识,密切注视有关的变化,逐步形成我国民众全面、健康的环境意识和积极、负责任的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这也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成熟标志。

参考文献(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戴星翼,1995,《环境与发展经济学》,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刘大椿等,1995,《环境问题——从中日比较与合作的观点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戎,1991,“小城镇发展和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1991(1)90—113。

马戎,1997,“人口和环境”,刘世定、丁元竹主编《迈向21世纪的中国的社会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65—308页。

马戎,1998,“必须重视环境社会学”,《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马戎,李建新,1997,“中国人环境意识的城乡差异”(1996年GOES中国调查报告)

曲格平,李金昌,1992,《中国人口和环境》,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环境报社编,1992,《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Harper, Charles, L. 1996,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忠